

文章编号: 1008—2999(2000)04—0061—05

伍尔芙的女性观和女性人物形象分析

赵红英

(武汉水利电力大学 外语系,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弗吉尼亚·伍尔芙以意识流小说著称于世, 通过探析伍尔芙女性观的成因, 探讨了其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 分析表明弗吉尼亚的女性观只能是对女性平等地位要求的平和的呼唤和努力, 而她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绝非女权主义者所推崇的反叛型女性。

关键词: 女性观; 女性人物; 女性意识; 意识流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英国女文学家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不仅以其意识流小说蜚声于世界文坛, 而且作为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开拓者为世人所公认。她是“一个中心, 不仅是一个局限于小圈子的中心, 而且是伦敦文学生活的中心。她的位置是在一些共同产生的特点和条件下形成的, 这些特点和条件, 以前没有产生过, 而且我认为以后也不会产生”。现代英国诗人 T·S·艾略特这样追悼弗吉尼亚的一生。而马尔柯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对弗吉尼亚·伍尔芙在 20 世纪文学中的贡献更是作了如下评价:“她全部创作之丰富和成就之巨大——不仅是九部小说, 女性主义文章, 评论书籍和罗杰·福莱伊传, 而且还有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日记以及书信,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她去世后出版的, 现在还不断出现, 使她一度曾被指责为狭隘的作品变得越来越成为她的时代, 她的精神世界和现代艺术思想的精髓。”^[1]

作为一位文学艺术家, 弗吉尼亚·伍尔芙遗留给我们的只是她的艺术作品, 是她从生活中截取的“永恒的瞬间”, 是她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属于她个人的独特幻象。众多的评论家对弗吉尼亚现代主义的手法及其新实验主义的探索倾注了大量笔墨。然而笔者认为弗吉尼亚作为女权主义代表人物的认定颇值得人们一思。

一、弗吉尼亚女性观的成因

始于启蒙运动时期的女权运动在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 使妇女具有男子同等的地位方面在 20 世纪已卓见成效。1870 年, 《已婚妇女财产法》通过后, 英国妇女拥有了自己的财产。1919 年英国妇女被允许参加

议会竞选。1928 年她们获得了选举权。

然而在 1929 年她发表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中, 弗吉尼亚却提出女子应拥有自己的空间并享有经济独立方能写作。那么是何种原因促成这本号称“女权主义宣言”的小册子的问世呢?

弗吉尼亚·伍尔芙出生于书香门第之家, 其父莱斯利·斯蒂芬爵士是一位著名的学者, 《国家名人传记大辞典》和《康希尔》杂志的主编。他的家经常高朋满座, 群贤汇集, 成为当时各种精英人物的荟萃之地。在这种活跃的文化氛围之中, 弗吉尼亚自幼耳濡目染, 得益匪浅。她虽然没有受过很多正规教育, 主要由父母亲教她读书, 但她博览全书(通过阅读他父亲丰富的藏书及大英博物馆、伦敦图书馆中的藏书)——哲学、文学、历史、语言无不涉足。弗吉尼亚自幼就有一种创作的欲望和冲动。九岁时, 她就在兄弟姐妹自办的家庭刊物《海德公园门新闻周刊》上写文章。她哥哥索比参加了大学生读书俱乐部, 大学毕业后他们在布卢姆斯伯里的家中举行了类似读书会的茶话会。每周一次的聚会使弗吉尼亚能有幸了解当时的学术动态, 后来, 该茶话会发展成布卢姆斯伯里集团。在这松散的集团里, 有当时英国知识界上层最重要的有创造性的思想家、艺术家、作家和学者。在这些文人雅士熏陶下, 弗吉尼亚从旁听者, 渐而成为讨论的积极参加者, 她的思想也逐渐成熟。这个集团视野开阔, 自由探索的精神鼓励她去发展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她很快成为该团体中一名活跃分子。1907 年在哥哥索比死后, 她成为星期四晚会上的中心人物, 小说家贝内特称她为“高雅之士的皇后”。

弗吉尼亚从父亲身上继承了敏锐的智力、写作的

才能和能言善辩、喜爱交游的性格；从母亲身上继承了秀美的姿容和善于幻想、感情丰富的特点。才华出众、容貌姣好的弗吉尼亚很幸运，找到了情投意合、灵犀相通的佳偶伦纳德·伍尔芙，并在1912年与之结为伉俪。弗吉尼亚的婚姻生活与她的文学事业紧密地交织在一起。1917年，伍尔芙夫妇创办了霍加思出版社。这个出版社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把有价值的文艺作品或学术著作介绍给英国公众。霍加思出版社出版了T·S·艾略特、E·M·福斯特、凯瑟琳·曼斯菲尔德、S·弗洛伊德以及其他名家的大量著作；也出版了弗吉尼亚在1927年后的全部作品，使她免于为作品寻找出版社而四处奔走。因此，弗吉尼亚在日记中无不自豪地写道：“是的，我是在英国可以自在地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唯一女性。”她父亲的遗产也足以使她摆脱靠写作为生的窘境。

弗吉尼亚的家庭生活使她能自由地发展其个性，发表言论，也使她对妇女的生存现状进行了反思。在维多利亚时期及以前，妇女的理想是当贤妻良母。她们在经济生活上依赖于丈夫，是丈夫俯首贴耳的奴仆和家庭中的点缀品。到了20世纪，女子却要走出家庭，在工厂、学校或办公室中找到一席之地，不仅要有独立的经济生活，还要有独立的精神生活。她们受过教育，思想解放，能言善辩，自由地和异性交往，参加选举活动。妇女的地位似有很大改观。

而正如伍尔芙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所描述的，她在“牛桥”大学的经历，让她感到在一所以男性为中心的高等学府中，女性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在英国博物馆浏览大量男性著作，她发觉“英国的历史是男性的历史，不是女性的历史”^[2]。人们对过去妇女的情况所知甚微，而关于男性世界，读者可在历史的长廊中发现许多描述。因此伍尔芙在这篇文章中指出19世纪的四大女作家——简·奥斯丁、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乔治·艾略特由于其性别，而被排除在某些种类的人生经历之外，其写作必然受到狭窄的生活经验的影响。她们的小说也就显示了强烈的性别特征，读者时常意识到一位女性的在场——有人在谴责她的性别所带来的不公正待遇，并且为她应有的权利而呼吁（如《简爱》、《米德尔马契》）。她们的艺术想象由于外界的压力而丧失了其完整性，有时不免太男性化或太女性化。伍尔芙在该篇论文中虽主要阐述妇女为何选择小说作为其表达自己的艺术形式，字里行间却流露出对女性历来所受到的歧视鸣不平。《一间自己的房间》不仅讨论了当时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一个女人要是想写小说，她必须拥有少量金钱和一间自己的房间”，而且以高度的机智和丰富的想象力展开了论证，

说明在一个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为妇女争取独立自主和从事文学事业的权利的必要。弗吉尼亚认为妇女只有强化她们与男性之间的区别，才能充分实现自我。

弗吉尼亚所生活的时代让她有机会实践自己的理想。她的文学创作活动本身就是对其女性观的注释。在20世纪上半叶整个西方世界笼罩着混乱和怀疑的气氛。人们已经不能接受维多利亚时期那种家庭生活的传统模式。他们不再敬畏王室的权威，而是自由地讨论甚至指责政府的缺点。他们开始不断怀疑过去被人们所公认的各种生活准则，并且认为不确定性是一种真正的规范。弗吉尼亚的作品正是用艺术的形式表现了这种思潮、感觉和情绪。与此同时，她的作品也试图在一片混乱的现代世界中找到某种价值观念，来代替那些已经崩溃了的陈旧的精神支柱。“弗吉尼亚在其不断的文学实践中，给小说找到了一种新的，可以非常真实地描绘出内心感受的写作技巧——意识流的写作方法”^[3]。她的作品只限于给读者提供一个关于生活的比较新鲜和奇异的视野，使读者开拓眼界。弗吉尼亚对小说的形式和结构极其重视。她认为对于小说家来说，把叙事者从叙事过程中去掉，让读者与人物接近一些，是十分重要的。“在她的小说中，几乎一切都记录在人物的意识之中。她在瞬间找到了永恒。她领悟到：个性是从不断变化中产生的统一体，意识是各种回忆和期望连续起来的混合物。”^[4]她的小说就是意识与意识的流动，她所重视的现实是人们感受到的种种印象的现实。

弗吉尼亚独特的生活经历及其创作实践奠定了其女性观。她并没有提出强烈的抗议，而是温和地要求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点空间和经济上的独立。她的文学理论自成一体，她的作品成为非传统创作的代表作，而她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更进一步验证了其女性观。

二、弗吉尼亚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

弗吉尼亚所创作的诸多作品虽主要以其意识流的理论与实践著称，而她在作品如《远航》（1915）、《达罗威夫人》（1925）、《到灯塔去》（1927）中给我们创造的女性形象更令人难以忘怀。这些作品中流露出的女性意识可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弗吉尼亚的女性观及其独特的女性视野。

1915年发表的《远航》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弗吉尼亚把女主人公蕾切尔描述成一位在幼年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接受过严格的家庭教育但天真无邪的女子。她已经24岁，却依然不懂人情

世故，更缺乏爱情方面的经历和体验。蕾切尔和安布罗斯相处的那段生活，与达罗威夫人的相识等对她的精神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使她了解一个前所不知的生活侧面：以全部身心忠于科学的里德利·安布罗斯，使她认识了科学家的忘我精神；美貌的海伦·安布罗斯，使她看见了妇女在爱情上的自我牺牲和对丈夫的无限忠诚；和达罗威夫妇的谈话，使蕾切尔开始对政界和上流社会发生兴趣；而与特伦斯的爱情使她初次对一些哲理性的问题进行了思考。蕾切尔与特伦斯性格形成强烈的对照：特伦斯受过正规的教育，少年老成，坚韧不拔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蕾切尔则心满意足地接受她所爱的人所说的一切。特伦斯正在创作一部取材于人们口中不言而心里所思的各种事实的小说，为其创作而博览群书，寻章摘句；蕾切尔则在一旁弹奏钢琴，答复信件。他们在花间月下散步，在旅馆拜会亲友，在僻静之处叙说情话。他们谈论着未来，似乎只要彼此相爱，其他一无所需。

蕾切尔有着很高的音乐天赋，她不屑于像其他人一样，为了找个好丈夫而学会弹钢琴。她对钢琴非常热衷，成天练琴，无视别人弹琴太多“胳膊会扭伤，嫁不到好丈夫”的议论。不仅如此，弗吉尼亚推崇男女间的相互交流。特伦斯与蕾切尔在一起无所不谈。家庭、艺术、友谊、两性之间的关系，爱情的本质，这一切都成了他们的谈话内容。而无论他们谈论什么，实际上都在讨论他们自己。尽管他们真诚坦率，彼此还是存在某种局限性，他们无法完全了解对方。不论他们之间关系何等密切，他们还是独立的个体：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一个是作家，一个是音乐家；一个受过大学教育，一个几乎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他们俩本能地、直觉地、甚至神秘地互相吸引，互相接近。在感情上，他们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在理智上他们又有某种程度的隔膜。他们相互之间的认识和感受，可以分解为两种不同的类型，或许可以把他们粗略地界定为理智的和情绪的，或界定为明确的和神秘的。特伦斯意识到，有“两种不同‘层次’的‘存在’”。在一个层次中，他们仅仅是像一般人那样相会、交谈；在另一个层次中，他们一起深深地下降到意识的底层。她由于热病死去，而她的未婚夫紧握着她的手。“这是一种幸福，完美无缺的幸福。”他梦呓似地在自言自语：“他们一直热烈期盼着的东西，现在终于到手了，这样的东西就是结为同心，他们活着是无法得到的。”如果说女主人公死得那么轻快，那是因为生活留不住她。可是她在生命之外，又开始了生活。蕾切尔逝世之后，特伦斯突然感到一种奇异的满足，因为，在某一个神秘的世界中，他们曾经心心相印、同感同鸣，这种精神上的和谐

一致，决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所改变。然而，当他的目光注视到桌子上的茶杯和碟子，他忽然意识到，在这儿还有一个现实的物质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再也见不着蕾切尔了”。伍尔芙无疑是在暗示读者，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日常现实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相识、相爱、订婚、航海、生活、死亡；另一个是内心的世界，在这个精神的世界里，上面提到的一切都可以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在这部小说中，伍尔芙告诉人们：妇女必须争取自己的权利，开阔她们的视野，改善她们的地位。对于那种必须以姿色取悦于男女的传统观念，伍尔芙尤其不满。蕾切尔之所以愿意与海伦·安布罗斯夫妇待在一起，就是因为他们和那些世俗之徒绝然不同。他们为她提供了“一间与整幢房子隔离的房间”，提供了“一片森林，一个避难之所”。而一位象蕾切尔那样的女性，也确实需要这样一个环境，来保证她精神上的自由发展。她的心灵充满幻想，她的心灵是和她父亲的航船、和波涛汹涌的大海、和贝多芬优美动人的乐曲联系在一起的。特伦斯与蕾切尔承认爱情“极其重要”，这似乎与 19 世纪小说人物并无二致。然而他们之所以强调爱情的重要性，并非因为它要导致婚姻的缔结、家庭的建立、社会地位和生活阶段的改变，而是因为陷入情网的恋人在内心体验到一种强烈的、前所未有的、情绪上的根本改变。伍尔芙所关注的正是这种内在的心理效应。而这种对女性的观注显示了弗吉尼亚温和的女性主义思想。

《达罗威夫人》和《到灯塔去》虽没有传统的故事情节，但从各人物意识的流动中我们也可以对女主人公形成一定的印象。

“《达罗威夫人》记录了保守党议员理查德·达罗威夫人克莱丽莎在一天 12 小时的现实生活和心理活动”^[5]。在 6 月中旬一个星期三的早晨，克莱丽莎准备亲自到庞德街去采购鲜花，为即将举行的盛大晚宴作准备。克莱丽莎是一位美丽的夫人，是上流社会的女士。她慷慨而又庸俗势利；她性格外向、喜欢社交而又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她感情细腻而又缺乏热情、偏于理智；她的举止带有年轻人的活泼，她的脸上带着老年人的皱纹；她知识贫乏，却又富于直觉；她热爱生活，因而惋惜时间流逝。在内心深处，她感到生命是一种互相依赖的生存，死亡是一种挑战和解脱。

克莱丽莎很爱彼得，但理智告诉她，他们结合在一起不会幸福。如果她嫁给了彼得，她就永远不会理解那种个人的尊严，那种在夫妻之间保持距离的含义。正因为这个缘故，尤其在婚姻问题上，“在同一所房子中相处的人们，必须有点独立性才对”。（《达罗威夫人》第 19 页）理查德给了她这种独立性，但彼得却总是

缺乏对别人感情的了解。

克莱丽莎努力想提出那些社会所极力回避的根本问题。她诘问所谓“爱情”、“生活”乃至“死亡”的意义，努力正视这些现实问题，如同它们正视她的存在一样。关于“爱情”，她反对彼得的强加于人的利己主义；关于“生活”她感到难以界定；关于“死亡”，她把塞普提墨斯的自杀想象成“一种交流信息的努力”。

然而，在附庸风雅、奢侈豪华的背后，克莱丽莎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是个对她所拥有的一切感到毫无意义的、受过挫折的女人。她还缺少的是同男人们、女人们建立一种更为密切的接触所需要的某种热情、某种激情。她不能摆脱她所熟悉的过去和现在的桎梏，不敢担当未来的风险。

《到灯塔去》里的拉姆齐夫人，是一位贤妻良母，富于直觉、风姿绰约。她善于持家，喜欢为亲友排忧解难，并且把所有的男人都置于她的庇护之下。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也许是因为男人们可以签订条约、统治印度和控制金融。她的孩子们尊敬她的极端谦恭和奇特的严厉。她对那些与之谈话的人极具理解力、聪慧和精细。拉姆齐先生则是职业的但却是并非有特色的哲学家。他对其他人出奇的冷漠，是一个冷冰冰、干巴巴、抱有辉煌梦幻的人。

“博爱之母拉姆齐夫人是伍尔芙笔下最具风采的典型之一”^[6]。拉姆齐夫人是所有情感倾注的中心，是理想化的欲望所崇拜的对象。她“高贵的仪表”并不是由于她道德完美而赋予的，而是由于她非凡的美貌。一个伟大而贤惠的母亲，在生活的圈子中包含并保存了人世间的美。拉姆齐夫人作为这样母亲的代表，激起了小说田园诗般的意象。伍尔芙的小说，对母亲维护生命的作用表示很高的敬意，把它看作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但它也承认，依赖母亲对于人的成长来说，对于把缺乏周密考虑的生活变为一种自觉意识来说，确实是一个威胁。拉姆齐夫人是人类欲望的对象及调解者。拉姆齐夫人促成了保罗与敏泰的婚姻。她所起的这种作用，和她对莉丽与班克斯所抱的两者结合的幻想，使她自己在以她为中心的圈子里的社交与情感生活中占优先地位。针对那些永恒的问题——痛苦、死亡、贫穷，她提出了自己的不容更改的准则：“人们必须结婚；人们必须生儿育女。”拉姆齐夫人作为一个人类命运的热爱者，体现了促使我们不断向前的永恒女性的一个方面。拉姆齐夫人主持的宴会，表达了爱的总体形式，表达了类似宗教团体联谊会式的宴会。女性辛勤忙碌，是为了建立组织和指挥以她为中心，然而缺乏表达形式的社会：“看来什么都没有结合起来。他们都分散坐着。进行结合、交流与创造的全部努力，都有

赖于她。”（《到灯塔去》第126页）拉姆齐夫人是“圣母”，她是一切活动的中心，在她死后，她仍然活在人们心中，指导着人们的行动——十年后到灯塔去的成行，莉丽画作的成功。

三、弗吉尼亚女性人物形象的思索

“弗吉尼亚的人物往往来自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贵族，他们的兴趣主要在精神方面”^[7]。如蕾切尔为了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更好地扬帆远航而陷入沉思。他们不甘心让人囚禁在密封的花瓶里或固定的阶层中。他们在表面上抑制自己的同时，对人进行观察，如达罗威夫人或拉姆齐夫人，“几乎本能地”了解“人”。这些狂热的个人主义者竟然能够成为他们自己那个圈子里的核心，如拉姆齐夫人，她的品格在她死后很久还放射着光芒。然而，拉姆齐夫妇以及他们那个靠母亲维系的家庭，就是“婚姻和理想夫妇的象征”。死亡只不过是生活中的自然故事。蕾切尔在获得幸福的时候死去，拉姆齐夫人则在她成功地把周围的人团结在一起时死去。

由于弗吉尼亚的良好生活环境，她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并没有振臂高呼女性权利，而是平和地表达出心中的期盼。弗吉尼亚笔下的女性有着现代女子的烦恼、困惑。她们没有经济生活的负担，有的只是更多精神上的苦恼。恩格斯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是否介入公共生活实际上成为决定女性命运的一个基本要素。弗吉尼亚笔下的女性并没有投身到社会实践中，而是充当了传统女性的角色——女儿、妻子、母亲。她们没能对前途命运作出自己的选择，她们并非女权主义者笔下叛逆和反抗的女性，却是依赖男性而获得寄生的享乐生活的女性。在性别意识上，弗吉尼亚强调了女性的权利，在价值观上似乎又认同了男权。因而弗吉尼亚作品中的女性是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揉合的矛盾产物。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人们长期积淀的审美观较为合拍，自觉不自觉地以男性标准来规范和调整了自己的行为特点。弗吉尼亚笔下的女性如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女作家冰心、凌叔华等笔下的女性，她们有时时代浪潮震动的涟漪，又有深深庭院荡秋千的轻吟和闲愁。她们是文明女性，而现代文明之风只不过使她们多了一些应酬（如晚会、交友等），其依附地位和根深蒂固的女性依附性（依附男性家道之兴旺）却并没有改变。这种依附的柔弱隐含着女性缺乏独立人格，自愿以男性为寄托、为依靠，不愿经风雨见世面的贵族的惰性。因此弗吉尼亚作品中的女性是处在新旧交替

夹缝中的女性。弗吉尼亚的女性观也只能被认为是对女性平等地位要求的平和的呼唤和努力，而她所塑造女性人物也并非女权主义者所推崇的反叛型女性。

弗吉尼亚为当时西方世界怀疑和混乱的气氛所困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空前浩劫使她记忆犹新，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她无疑于破坏、死亡、理智的丧失、文化的毁灭。幼时同母异父的兄弟的骚扰，后期对其作品的不满等等，使她彻底崩溃。1941年3月25日，弗吉尼亚主动投入了上帝的怀抱。

然而，伍尔芙用那象征主义的细腻笔触，惊人洗练的描写，成功地给我们创造了永恒的情趣与瞬间，给我们留下几个虽不完整、却能展示其女性意识的女性人物形象。

参考文献：

- [1] 王家湘. 二十世纪的吴尔夫评论[J]. 外国文学, 1999,

(5), 61—51.

- [2] 瞿世镜. 伍尔芙研究[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
- [3] 瞿世镜. 意识流小说家伍尔芙[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9.
- [4] DAICHES D. Virginia Woolf [M]. Norfolk: New Direction, 1941.
- [5] 朱 望. 试析《达洛卫夫人》的两重情节结构[J]. 外国文学研究, 1996, (1): 65—68.
- [6] 申富英. 评《到灯塔去》中人物的精神奋斗历程[J]. 外国文学评论, 1999, (4): 66—71.
- [7] LEE H. The Novels of Virginia Woolf [M].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Publishers, 1997.

(责任编辑 于华东)

Analysis of Virginia Woolf's view on and creation of female characters in Virginia Woolf's works

ZHAO Hong-ying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Wuhan Univ. of Hydr. & Elec. Eng.,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essay has probed into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Virginia Woolf's main works after reviewing the formation of Virginia's view on the female. Analysis has revealed that Virginia Woolf, in spite of being consider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women movement, only shows her effort to ask for the equality of women instead of creating rebellious female characters in her novels.

Key words: view on the female; female character; female consciousness;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上接第51页)

参考文献：

- [1] 宁 南. 试行期权激励的三大模式[J]. 经济管理文摘,

1999, (20): 23—26.

- [2] 蒋顺才. 如何设计股票期权方案[N]. 中国经营报, 2000—02—12(3).

(责任编辑 彭庆荣)

Option system and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LU Zhao, ZHANG Yan, AO Xia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 of Hydr. & Elec. Eng.,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the center link of entire economic system all along. To quicken the pace of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o mak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get rid of their dilemma early, this paper suggests trying the option system in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analysis of existing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for guaranteeing the option system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Key words: option system;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spiring mechanism; bridling mechanism